

820520

日本学者 论《实践论》、《矛盾论》

王乐夫 译
马 宁 校

广州地区高等院校哲学教研组

译者说明

一、很早以来，日本学者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很重视，并译为日文广泛进行研究。为了更全面地、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编译了这本名为《日本学者论〈实践论〉、〈矛盾论〉》的小册子。其中选译了日本近三十年来七位学者（多是有影响的知名学者）撰写的十四篇有关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到检验真理的标准、《矛盾论》（以及毛泽东哲学）的特点、《矛盾论》的历史地位、《矛盾论》的重要贡献、对《矛盾论》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实践论》以及《矛盾论》的存在问题等广泛的内容。这些论文是日本学者研究毛泽东哲学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它不但对我国研究日本现代哲学的专业工作者，而且对学习、研究毛泽东哲学的广大的理论工作者，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为了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反映日本学者研究《实践论》、《矛盾论》的发展概貌，对于早期发表的论文以及观点根本对立的论文，我们也加以编译，收进此书。请读者阅读时注意其论文发表的时代背景，并对其观点善加思考，全面分析，正确对待。

三、“作者简介”主要参考严绍璁同志编写的《日本的中国学家》及《现代日本人名事典》等书编译而成，在此特予说明。

四、我们主观上虽努力多方面收集资料，并想尽量翻译得好些，但是由于资料缺乏，时间短促，加上水平限制，除了在内容上存在着片面不全，甚至挂一漏万的问题外，其他方面的缺点也肯定不少，企望各位读者热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将来有条件时再行补充修订。

译者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于中山大学

目 录

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兼論毛泽东在哲学上的缺陷

藏原惟人 (1)

论真理性的证明

——評藏原惟人对毛泽东哲学观点的批判

田坂静夫 (13)

关于辩证法的方法中的检验问题

——兼論田坂静夫的《論真理性的証明》

大井正 (29)

关于辩证法的认识论

——答大井正先生的批評

田坂静夫 (41)

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 (之一)

——以《矛盾論》为中心

松村一人 (58)

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 (之二)

——以《矛盾論》为中心

松村一人 (73)

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 (之三)

——以《矛盾論》为中心

松村一人 (86)

关于《矛盾論》的一些问题 (上)

——我的理解的再研究与对批評意見的探討

松村一人 (109)

关于《矛盾论》的一些问题（下）

——我的理解的再研究与对批评意见的探讨

.....松村一人(142)

毛泽东辩证法的一些问题

.....新岛淳良(166)

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

——关于《矛盾论》的翻译问题

.....竹内好(188)

“兼听则明”

——答竹内好先生

.....松村一人(206)

再论毛泽东思想

.....竹内好(228)

对抗性的矛盾与非对抗性的矛盾

.....须田祯一(248)

.....

.....

.....

.....

.....

.....

.....

.....

.....

.....

.....

.....

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兼论毛泽东在哲学上的缺陷

藏原惟人

与当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政治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据报道，从去年夏季开始，中国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现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主张“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被新闻界称之为“实践派”的人占了统治的地位。尽管一般新闻界的报道是不完全的，但这场争论，即在所谓“四个现代化”的运动中，对十几年来来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四人帮”的批判，不仅批判“四人帮”，还不得不涉及到推进它的毛泽东的理论。过去，毛泽东的理论，更准确地说，是收集在《毛泽东语录》里的他的个别的言论，每句都作为绝对的真理，谁怀疑它、否定它，统统被斥之为修正主义。而从去年七月起，“理论必须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张却在不断加强。

我想，这样的主张和为此而展开的运动确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问题是，推进这个运动的中国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怎样理解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并打算怎样把它反映在现实的政治里。“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最后标准”，这是唯物辩证法理

* 本文标题是译者加的，本文是《历史中的辩证法》一文中的第九部分。

论的一个根本命题。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主张实践是人们的认识与理论的源泉、是认识与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同时又主张人的认识与理论必须用正确的知识与理论来检验。列宁喜欢讲这样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人 的 实 践

那末，什么是实践？所谓实践，广义来说，它是创造人类社会生活必要条件的人们的活动的总称。它包括人们必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与此相结合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改善与变革的活动以及行政的、教育的活动、科学、思想、艺术等的文化活动。我们认为总的来说，它可分为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两个方面。但其基本的方面是物质的实践。

在实践当中，还可进一步区分为个人的实践、集体的实践以及当前必要的实践、将来长期的实践，其中也有被称之为世界史的、全人类史的实践。

有的是个人认为正确，但根据实践却证明它是不正确的。至于科学假设的正确与否，则要通过实验来证实。还有各种大小集团制订计划加以实行的事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些也和算数的验算一样，从广义来说都不应算是用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称的实践，既不是单个人的实践，也不是某个集团的各个时期的实践，而是一个总的集中，即多数人在自然和社会里，经过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年的活动的经验的凝积的实践。

列宁在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时说：“对黑格尔说来，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学的格。这是对的。”那是在黑格尔的反意上说的。列宁说：“相反地，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

定下来。”（《哲学笔记》第204页）。

然而，就经过数十亿次无数反复的实践而得到的知识都不能算是完全的绝对的真理。更何况各个个人或各个集团在一定时期里，认为正确而进行的实践通常更不能起到检验真理的作用。因为这个实践还必须接受检验。那么，检验这个实践的又是什么呢？

实践与理论是互相联系着的。作为这二者的对立面的统一，通过其双方的相互检验，从而双方都得到了发展，而逐步地接近真理。人类在自然和社会里的行动，在改变自然和社会或者使其发展的人们实践中，人们的知识和理论发展了，根据这些知识和理论检验过去的实践，从而产生了新的实践，而这新的实践又发展了人们的知识和理论，一切都是这样无限持续地发展着的。在这一过程里，实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等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的主张，也是我们的见解。

在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由毛泽东领导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严重破坏，因而有必要改变它的政治实践，首先计划的以经济和军事为中心的恢复和发展就是现在的所谓“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和运动。仅从这一点而言，我对中国领导集团正在进行的或准备进行的政策和运动是理解的。然而，毛泽东所犯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仅仅在于他的“实践”概念，还在于他的脱离中国现实的理论与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政策以及这个政策的实行。

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一点，不严肃地检讨和反省过去，不确立建立在中国的基础上的正确理论，而以当前的经济的、

政治的必要性所产生出来的“实践”为名，把一切统统看作是合理的，那末，其结果就会陷入拒绝认识现实的客观规律的必要性，陷入“能对生活带来有益、有效的结果就是真理”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实用主义的立场，就孕育着重犯毛泽东晚年同样错误的危险。

为了弄清楚毛泽东在哲学上、理论上的缺陷在哪里，有必要研究他一九三七年以来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的这两篇哲学论文，对于中国及其追随他的日本的一部分学者们来说，被看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峰。但是，在今天，正如我国的尾崎庄太郎、高田求、竹内实以及其他各位先生通过研究而明确指出的那样，这两篇哲学论文是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前半期的苏联哲学的所谓“列宁阶段”里产生的、以米丁等为中心的教程、辞典的著作为基础的，而且不少部分几乎完全是借用的，毛泽东增加了自己的若干解释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运动的实例。与其说它们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研究之上而写成的著作，莫如把它说成是基本上通过从日本翻译的这些苏联的教科书的著作的学习而写成的。

这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在延安这个特殊的地方是不得已的，所以我绝不否认毛泽东在那种境况下集中写成的哲学著作的积极意义以及它对当时的中国和战败后的日本所给予的启蒙的意义。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它反映的是一九三〇年前后以苏联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水平以及毛泽东自己理解它的中国的思维方法。因而如今有必要对它进行研究。

对于这个问题，因我今天无暇详细论述，留待他日。在

这里，我只想提出同本文有密切关系的《实践论》里的两、三个问题，尽量简单地谈谈我的总的看法。

毛泽东在《实践论》里，把人的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加以论述。举下面的例子说明之。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都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合乎理论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里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

从这个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到，毛泽东是把认识分为感性的认识与理性的认识，而所谓理性认识的“理性”同我们通常所说的“知性”的意思是同样的，也就是把感觉得来材料

综合整理成为概念的思维作用。

大家都知道，黑格尔把人的知性分为悟性和理性。这是康德与黑格尔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继承下来的理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恩格斯对此写道：“悟性和理性。黑格尔所规定的这个区别——依据这个区别，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合理的——是有一定意思的。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狄多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二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的动物），以及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相反地，辩证法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人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45页）。

我在论文的前面引用的恩格斯关于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区别的两个思维方法同这里说的悟性的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不同是相对应的。而毛泽东在《实践论》里所讲的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混同的。本来是理性的认识，往往被说为悟性的认识。如果从逻辑方面说明的话，辩证逻辑在不少场合下是统一于形式逻辑里的。他虽然常常使用理性的或者辩证的这些概念。但我认为，他的思维方法基本上更多的是悟性的，形而上学的和形式逻辑的。

毛泽东在这篇论文里，从理论上，实际上批判了各种各样的偏向，其中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引用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话来证明理论的重要性的同时，他强烈主张实践更为重要。然而，他在这里所说的实践，有不少地方只是意味着行动与经验，而且是

个人的行动与经验。前面引用过的考察延安的例子就是证明。他在另一个地方写道：“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虽然他接着指出也必须尊重古人与外国人的经验，但是他作为中国的领袖的这种经验主义、体验主义的思维方法，就招致了“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所谓“下放运动”及其悲惨的现实的出现。我认为，学生和知识分子通过一定的形式获得劳动经验是重要的。但是正在读书的二年级至十年的学生抛开学业，强迫他们到农村、工厂去劳动，这给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很清楚的。而且根据“实践的检验”，也即从做的效果来看。并不是开头所说的那种性质。

在这里，他还批判了“左”翼空谈主义。他说：“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毛泽东于一九四〇年前后写的这些话，正预见了往后还不到二十年的一九五七年开始的所谓“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再过八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他自己的思想与行动。我怀疑这些话对这些思想行动说来不正是警告性的言语吗？这些不正是“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思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的离开当前现实的“幻想”吗？最近为解放军所破坏的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可以说

是学了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并且，他们的幻想比这还要厉害得多。

毛泽东在“大跃进”的失败之后，承认了错误，并进行了一次自我批评，多少纠正了他所遵循的这条路线。但是，“文化大革命”又持续了十二年之久。这同列宁在俄国革命后提倡的“文化革命”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在俄国革命不久就认识到了其后的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里所犯的错误，因而提倡“新经济政策”与“文化革命”。这是为了扭转当时俄国社会与人民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文化的显著的落后状况，在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上完成应在资本主义时代进行的现代化，以便通过它并以它为基础来发展社会主义。他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期写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里说道：“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列宁选集》第四卷，698页）。

与列宁相反，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是企图在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的现代化都还不发达的中国，用他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话来说，即超越“一定的发展阶段”，一举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文化。而把提倡现代化与民主化却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走狗”来加以批判肃清。

我丝毫不是过低评价统一了广大的中国，并为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斗争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伟业。相反，我对他那时的高度评价现时仍然不变。但是，不论是谁，只要陷于过于自信，就不能进行正常的判断和行动。晚年时，他

许可对他的个人崇拜，在他具有那样的权威的情况下，象通常那样，在他的周围逐步结成了阿谀奉承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集团，搞什么亲信政治，排斥异己。在那里，斗争是必然的。但是，从见解和政策的不同来看，表现出的完全是一种无原则的权力斗争。

前车之鉴，勿蹈覆辙。我希望中国的领袖们正确认识上面这一点，并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与实践，不仅在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而且在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在已经开辟的“现代化”道路上，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以上是我就“历史中的辩证法”所要谈的内容《辩证的历史》。最后，我想再次说明的是，完全不是想以理性的、辩证法的名义来否定或轻视一切感性的、或者悟性的、或者形而上学的、或者形式逻辑的东西。我的主张是，那样的思维方法是机械论的、形而上学。当然，感性的东西，悟性的东西，它是作为理性中的不可缺少因素，重要的要素而存在着的，而且必然存在着的。

通常，感性的东西往往是我们认识与行动的出发点，应该是基础性的东西。如果去掉了感性的东西，就没有我们的生活，连我们的艺术、哲学和科学也不会有。对此，我们必须把列宁喜欢引用的歌德的《浮士德》里的“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绿的”这一警句铭刻于心。

此外，在人类的思维的发展历史中，悟性的东西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人们的知识与认识都是必然的、不可缺少阶段。而悟性也还是个人知性发展中的必要阶段。列宁曾经说过含有这样意见的话，即首先应该教给青年以形式逻辑学。这不仅在个人的情况下，就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同时

伴随而来的现代的文化与知性的也不发达的地区，悟性的东西还是明显地起着积极的启蒙作用。列宁主张在宗教及其他迷信影响很深的革命后的俄国，应当普及十八世纪的唯物论，其理由之一就在于此。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在我们的政治领域内，悟性的判断常常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在政治领域内，善或者恶，赞成或者反对，敌或者我，这些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常常就有形式逻辑的“A或者B”的所谓二者择一的判断。也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判断在一定历史阶段里怎样的社会体制才是正确的，也不能不“形而上学地”来加以选择。

然而，重要的是，一切事物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的范围之内的。如果就整个宇宙来说，一切事物都不是静止的、固定的、僵死的、孤立的，而总是处于运动的、变化的、矛盾的、联系的、辩证法的生成与发展之中。如果忘记了这一切，把部分误认为全局，那就连暂时的、过渡的、部分的东西也不能理解、判断，更不能进行正确的实践。

列宁把上面引用的这一部分内容写在《谈谈辩证法的问题》的最后部分里。他说：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

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即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知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列宁选集》第二卷715页）。

在这里，我们现在有必要增加的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把这些固定化、教条化，那么它就有转变为它的对立面——形而上学的理论的危险。

恩格斯也这样写道：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马恩选集》第三卷，61页）。

“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

的东西。”（《马恩选集》第四卷213页）。

在引用了列宁和恩格斯的这些论断后，我已经感到没有什么可以补充了。我只想在最后再次强调：要学习自然、社会、思维、生活和行动的辩证法，要将其有效地运用于时代的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去为其服务，就必须重新仔细阅读并体会列宁、恩格斯的这些教导。

（摘译自《科学与思想》第33期，1979年1月17日）

藏原惟人（1902——）

文艺评论家。

明治33年出生于东京都。大正12年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俄文专科毕业。大正14—15年以都新闻特派员名义留学苏联。回国后参加《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以后创设《全日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指导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昭和5年11月赴苏。次年2月出席世界工联第五次大会。次年2月4日，一边从事地下活动，一边从事有关创作方法上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宣传工作。昭和7年被捕入狱，15年获释。战后，昭和22年被选为日共中央委员，25年去职，后任新日本文学会会员、苏联研究者协会会员、文学家协会会员。

主要著作有：《艺术论》、《艺术书简》、《毁灭》（法捷耶夫）、《我的大学》（高尔基）、《铁流》（绥拉菲莫耶夫）。

论真理性的证明

——评藏原惟人对毛泽东哲学观点的批判

田坂静夫

〔提要〕反映于感觉或悟性中的客观存在的形态常常是并存的与继起的，所以没有普遍性或必然性。……在自然界中，辩证法的法则作为实例是存在着的，但它不反映到头脑而产生思维的辩证法，只在有了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即理性的认识方法之后，自然辩证法才反映于头脑之中。

藏原惟人在《科学与思想》第33期上发表了题为《历史中的辩证法》的长篇论文。并非哲学家的藏原为何要撰写这样的文章呢？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只要看一看其中对毛泽东的恶毒攻击，也许可以看出藏原所代表的宫本修正主义一伙的真正目的。因除此之外，再也不能找到他发表这种集陈词滥调于大成的文章的理由了。

藏原在论文中展示出来的是从古今中外的文献中集中起来的大量有关辩证法的论述或实例。其博学可谓惊人。但在藏原自己的阐述中却丝毫不见任何新的哲学研究成果，全是重复历来哲学教科书的论述。竟满足于这种陈腐的知识，实令人钦佩，这大概就是修正主义者的特性吧。如果这篇论文代表了宫本修正主义的理论水平的話，其停滞不前之境况，实令人惊讶。文中充斥着大量的引证，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内容的无思想性，然而，无论怎么乔装打扮，乌鸦终究